

冷戰終結和全球化悖論

——中美關係的大歷史

劉鳴原

冷戰結束以後，中美關係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以至於出現種種關於當前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新冷戰」的說法。未來的歷史書寫是否會用「新冷戰」來命名我們這個時期，不可預知。據筆者觀察，今天這些稱呼的流行，取決於使用者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立場，與相關的冷戰歷史關係甚微。本文討論三個問題：第一，為甚麼現在的中美關係不是「新冷戰」？第二，歷史上的冷戰和今天的世界是甚麼關係？第三，當前的中美關係在大歷史中處在甚麼樣的位置？本文的基本觀點是，今天的中美關係既不是「新冷戰」，也沒有面臨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中美之間所存在的問題，反映的是一個遠大於兩國雙邊關係的現象，即全球化發展的悖論。

一 「新冷戰」

中美關係在二十世紀70年代開始緩和以後，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他再版的名著《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裏指出，中國重返國際社會，對冷戰鬥士有一種「思維解凍」的效果^①。但是，中美關係在冷戰時代「解凍」後，雙方政策精英的思維僅經過了一段有限的鮮活期，而其後續發展至今，似乎又有進入新的冷凍狀態的危險。在美國，國際政治精英陷入了一場關於中美關係是進入了「新冷戰」還是「冷和平」的爭論^②。而在中國，究竟是展現「戰狼外交」的尖牙利爪，還是擺出「熊貓外交」的憨態可掬，似乎也尚無定論^③。

把新鮮的歷史記憶和當下的難題摻雜在一起，這種情況在上世紀發生過一次，惟結局不佳。1931年，法國詩人兼哲學家瓦勒里(Paul Valéry)寫下過這樣一段話^④：

歷史是人類智慧合成出來的最危險的產品。歷史的方方面面為人所熟知。它會引發夢想，使整個民族陶醉其中；它會導致虛假記憶，使人神經過敏，舊傷不癒，不得安寧；它會帶來榮耀或受虐的幻像，造成民族之間的怨恨、傲慢、難以容忍和虛榮。

當時的世界正深陷經濟大蕭條，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記憶猶新，擔心世界會以同樣方式再次走向大戰。但是，為避免大國再戰而設的國際聯盟、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等措施，都未能成就「集體安全」。就在瓦勒里寫下上面那段話的同一年，日本對中國東北發動侵略，宣告了國聯的破產。隨後，伴隨着英法政客的「綏靖」曲調，希特勒 (Aldof Hitler) 擴張「生存空間」的外交、軍事舞步，將世界引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後，歷史學家索恩 (Christopher Thorne) 和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分別對這些將人類引向黑暗的妄行做了忠實的記錄^⑤。

當今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與一戰後有某些相似之處。雖然各種對世界再次進入大戰的警告一直沒有停息，上世紀冷戰遺留下來的某些執念，卻又在鼓勵好勇鬥狠和爭強好勝。由此可以預期，未來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學家，不會缺少令人扼腕的素材。未來雖然不可預知，歷史卻是鑿鑿在案。今天的國際事務，不可能複製或翻版上世紀的冷戰，任何冷戰思維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害莫大焉。以下試論三點^⑥：

第一，冷戰的核心內容，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了實現各自普世意識形態的終極目標，相剋相殺；是源於西方文明和歷史發展的兩個對立體系之間的優劣生死之爭。世界毀於核戰爭的危險，使美蘇之爭止步於「冷」，但是美蘇之爭對於各自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又都是生死攸關，因此必然是存亡之「戰」。與此相比，今天國際事務的中心問題，是一個多元的世界如何在日益擁擠的地球上找到共存之道，中美關係只是這個中心問題的一種表現。固然，今天的美國依然以世界上「民主自由的燈塔」自詡，同依然是一黨執政的中國形成對比。但是無法否認，中美作為世界上的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仍然共處於同一個世界金融經濟體系。所謂「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在這個體系裏發揮着重大的支撐作用。目前，中美兩個國家之「冷」事出有因，兩個「陣營」之「戰」卻子虛烏有。中美之爭的勝與負，也不決定各自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生與死。

第二，冷戰的組織和進行方式，是排他性軍事集團的地緣政治對抗。所謂「冷戰」，實際上是美蘇兩個集團對終極大戰的不斷準備，以及各自的所謂「代理人」之間的持續局部熱戰。這種欲戰非戰的國際大勢，主導了當時冷戰集團內外的國際關係。而今天國際關係的主題，既包括了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也涉及地球南北國家之間地緣經濟和行為規範的重新整合，還有人無分東西、地無分南北的全球生態環境大危局。冷戰所遺留下來的軍事集團，僅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餘威尚存，但已經仿如白堊紀以後的恐

龍，形單影隻。冷戰時期美國在世界各地維持的龐大軍事存在，也因對手蘇聯的消失，成為美國經濟的負擔、國家安全的軟肋、國際聲望的負資產^⑦。而中國迄今為止的對外國策重點，是着力於擴大地緣經濟、地緣文化聯繫，企圖另闢與歷史上西方國家不同的大國之道。在冷戰中，中國結盟蘇聯在先、結伴美國在後，教訓尚在，至今沒有採取結盟的政策。今天國際關係的特點是，各國在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文化等諸多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這樣高度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世界裏，冷戰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軍事集團不但力不從心，更是投鼠忌器。美蘇在冷戰的世界裏，時時、事事、處處針鋒相對。今天的中美則不同，兩國國際影響的投射方式，是各行其道而極少正面交手，言語不和卻相互多有所求。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來說，這樣的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異於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不必面對在兩強之間選邊站的困境，卻坐享外交獨立的良機。更有外交靈活如隨風之竹者，希圖左右逢源，採取一種聯美求安全、聯中求發展的互補國策^⑧。

第三，冷戰年代的國際舞台，上演的是一場以歐美為主場的二人轉獨幕戲，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當然的主角。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說法，毛澤東治下的中國是循《孫子兵法》的古訓順勢而為，勉強同美蘇形成戰略三角，而位居最弱^⑨。今天的國際舞台完全不同，是一個全球範圍的大轉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商業、科技、金融、環境、人權、網絡空間等多個場景輪番出現，每個場景又有多個角色，令觀察者應接不暇。除了中國和西方諸大國以外，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巴西、尼日利亞、南非以及更多的非西方國家，都有自己的戲碼。同時，形同獨立實體的龐大跨國公司、專注人類某些特定議題的非政府組織、瞄準特定目標的隱秘恐怖主義集團，也都有自己的戲文要唱。二戰以來習慣飾演主角的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每齣戲裏仍然要擔綱，總是忙於趕場換裝、變換臉譜，不免顯得左支右絀。1970年代末才開始向世界開放的中國，涉世未深，迄今為止些許引人注目的國際作為，主要限於經濟發展、商貿和基礎建設等領域。在國際政治的熱點問題中，中國的影響雖有擴大的趨勢，但其身影仍然限於中國的傳統周邊國家。簡言之，今天的國際事務已經不再演繹於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舞台，其中心也沒有轉移到亞太舞台；所謂國際政治的熱點問題，在全球範圍內此起彼伏。中美雙邊關係在任何意義上的「冷」、「熱」與否，都不足以制約和支配全球大小豪傑的行為。環球涼熱，取決於各地經緯，而不是像冷戰時那樣，任由兩個超級大國予取予求。

簡言之，把今天的中美交惡與美蘇冷戰類比，既缺乏對歷史的了解，也缺乏對現實的洞察。實際上，自二十世紀末以來，「新冷戰」或類似的概念已經被用在幾種性質十分不同的國際關係上^⑩。有關這個概念的適用性的爭論，也已經存在了很多年。這種情況本身就說明，無論對當代史研究還是對國際政治分析來說，「新冷戰」只是一個方便借用的名詞，而不是一個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準確概括。

二 歷史、今天和冷戰

然而，這並不是說，今天的國際局面與冷戰沒有關係。恰恰相反，我們的時代脫胎於冷戰時代，冷戰對當今世界面貌的形成，功莫大焉。正因為冷戰孕育了二十一世紀，冷戰時代的意義遠遠大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勝敗。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冷戰結束時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至今已經有三十餘年^①。冷戰的結束當然沒有終結歷史，但是「歷史終結論」並非一無是處。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很多歷史脈絡，每個歷史脈絡都有自己的起點和終點。冷戰同當代的聯繫，在於它對不同歷史脈絡的三種作用，即終結、延續、重啟。以下試舉幾例：

第一，歷史終結的例子。冷戰時代終結了西方殖民帝國的歷史，可以用一些數字來證明。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得到國際廣泛承認的國家有八十幾個。但是，根據1922年版的《泰晤士世界地圖集》(*The Times Survey Atlas of the World*)，在當時的世界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只有十一個國家，其中九個是歐美國家，兩個是亞洲國家，即日本和中國。除了中國，其餘國家都是殖民帝國，中國的重要性也僅限於地廣人多^②。二戰結束後，世界上的獨立國家增加到九十幾個，在冷戰結束後又躍升為近二百個。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之前，西方的殖民帝國已經紛紛解體，由歐美幾個國家掌控世界多數人民生活的時代，在冷戰中結束了。殖民帝國歷史的終結，不僅是新興獨立國家歷史的開始，更是一個新的歷史大潮的開始，下面另作說明。

另一個歷史終結的例子是西方兩大意識形態在全球範圍內的所謂「普世」之爭。文安立 (Odd A. Westad) 在《全球冷戰：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我們時代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中指出，美蘇各自代表了兩個對立的歐洲現代主義理念，雖然都是從反對殖民主義的動機出發，卻又對發展中國家橫加干預，以輸出自己的政治價值觀、一元歷史敘事和經濟發展模式。這種干預和輸出是美蘇贏得在全球範圍內的普世之爭的途徑^③。全球冷戰最終以蘇聯解體結束，但是這個結局並不像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所認為的，意味着以美國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的終極勝利。冷戰以後的國際發展，日益揭示了冷戰終局的真正意義是一元歷史敘事在多元世界裏的破產。在這個意義上，美蘇都是輸家。

第二，歷史延續的例子。對於冷戰，大的歷史延續是全球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 (Jeffery D. Sachs) 在2020年出版了《全球化的幾個時代：地理、技術與制度》(*The Ages of Globalization: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④。書中描述了從古到今人類經歷的七個全球化時代，大趨勢是人類科技的不斷進步，造成人類生活在地理、生態、文化、組織各個方面日益緊密的聯繫。可以說，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全球化的歷史。但是，每當出現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科技突破，大大提升了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的時候，人類卻往往在這種科技進步的伴隨之下，進入新一輪的衝突或戰爭。我們這

一代人親身經歷了數碼信息時代的到來，也耳聞目睹了數碼信息如何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影響和改變了人類交往的模式。現在的人們正在經歷全球化的第八個時代，即人工智能(AI)時代的降臨。中美之間的芯片戰以及俄烏戰爭、以哈戰爭中採用的無人機等技術，都只是未來好戲、壞戲的開場鑼。

小的歷史延續是各個國家和地區自身的歷史發展。這種發展和延續有的受到冷戰影響，有的和冷戰毫不相干。全球化是通過地方化實現的，所謂全球冷戰也必然表現為冷戰的地方化。冷戰不見得遍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也遠遠不能涵蓋各國、各地區歷史進程的豐富內容。而那些被冷戰侵蝕的地區，也有足夠強韌的本土元素，將冷戰變得面目全非。以中國自身的經驗為例：台灣問題在二十世紀幾經變化，從日本殖民帝國的遺產，到國共內戰的殘局，再到冷戰時期美中對抗的棋子，其中冷戰的歷程對今天台灣問題的格局影響至鉅^⑮。即便如此，台灣地位和台灣人身份等問題，在冷戰之前早已存在，這些歷史脈絡至今不衰。同樣，在中國的另一邊，美國的冷戰觸角通過中央情報局(CIA)的秘密戰爭，延伸到喜馬拉雅邊疆地區。但是對這個地區的族群政治和國際關係的漫長歷史來說，美國的捲入只是一段插曲而已^⑯。所以，所謂冷戰時期的歷史，既包括冷戰本身的歷史，也包括冷戰邊緣的歷史，更包括冷戰以外的歷史。後兩種歷史的存在與發展，都比冷戰要長得多。

第三，歷史重啟的例子。冷戰時期歷史重啟的例子，最顯而易見的應該是中國。在冷戰時代，中國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和姿態，重新在世界事務中佔據了一個重要位置。拿破崙對十九世紀中國問題的評論，被戲劇化為：「就讓中國沉睡吧，因為中國一旦醒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⑰從十九世紀中期中國的衰落開始，西方人對中國的重新崛起，已經猜測、預言、期待或懼怕了近兩個世紀。1949年「紅色中國」的誕生，對世界確實是一種震撼，爾後中美在朝鮮兵戎相見，更令西方視紅色中國為最具侵略性的敵人。但是，很快中國就深陷自己的「繼續革命」，與國際社會處於相對隔絕的狀態。而其後冷戰的發展，卻給了中國回歸國際社會的又一次機會。從周恩來與尼克遜(Richard M. Nixon)的握手到鄧小平的國際接軌，中國再次震動世界。冷戰原本是在歐美意識形態、倫理觀念和地緣政治的語境裏發生的，說得極端一點，是二戰後美蘇自戀、自虐、自我膨脹的產物。中國回歸國際社會的契機固然產生於1960年代末中國國內和周邊的嚴峻形勢，但在宏觀方面，更得益於美蘇全球冷戰、爭執牛耳而不能自拔。1970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並同美國握手言和，這是中國回歸國際社會的第一步。世界事務的語境因此開始了重構。正如費正清指出的，中國重返國際社會，將人類不同文明的共存問題，重新提上國際政治的日程^⑱。最令世界瞠目結舌的是，緊接着中國作為一個實力大國重新崛起。1979年鄧小平赴美，完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開始的中美外交關係的正常化。但是對中國的崛起來說意義更加深遠的，是雙方同時簽訂的《中美科技合作協定》。雖然以後的中美關係又歷經坎坷，但兩國政府依然續簽該協定至今^⑲。

中國的重新崛起，對中國來說，是又一個歷史周期的開啟；對世界來說，則是國際事務從兩極向多元轉變的重大事件。在這些方面，中國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埃塞俄比亞裔學者葛姐秋 (Adom Getachew) 在2019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帝國之後的世界再造：民族自決的興衰》(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 ②。她提出，非洲國家在冷戰時期的經歷並非限於「去殖民化」。這些新興國家的集體目標，是締造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更新世界的組織理念、重新定義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中的公平和公正。不然「去殖民化」和「民族自決」的結果，只會使這些國家仍然無法從前殖民帝國設置的現存國際秩序的陷阱中脫身。這種來自非西方、非大國的集體訴求和國際努力，就是上文提到的「新的歷史大潮」，也是冷戰年代為二十一世紀開啟的最有建設意義的歷史遺產之一。

如上所述，西方主導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導致世界從多極走向兩極，這個過程走到盡頭，又讓世界準備向一個更久遠的多元狀態回歸。這裏的所謂「回歸」，並不是歷史的循環。世界早已不可能回到十六世紀以前那樣幾大文明區域相對隔絕的狀態。二十一世紀已經過完四分之一，種種迹象表明，從冷戰時代脫胎出來的是一個新的多元時代。眾多非西方國家的興起和發展，使得世界事務已經不再是偏愛實力的「極」式思維的殿堂，人們也不能再容忍如「西方和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 一類的陳舊狹隘的二元文化論 ③。今天的國際政治局勢，產生於冷戰對兩極的消耗和冷戰為兩極以外的國家締造的機會。當前的國際社會，已經不再是西方強國把持的「國際精英社會」。冷戰時期的去殖民化進程和中國重返國際社會，是「國際政治全球化」的重要步伐。與十七世紀以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Westphalian system) 在全球的擴張不同，與文安立所描述的美蘇制度各自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也不同，現階段的「國際政治全球化」不再是此前的國際政治體系的「西方化」，而是在各國歷史發展基礎上產生的國際社會的「大眾化」。同時，由於信息技術和網絡空間的發展，當今「國際大眾」的集結早已溢出了國家的邊界 ④。最近美國的「TikTok 難民」集體湧入中國網絡平台「小紅書」的現象，即是當今「國際大眾社會」多維景觀的最新展現。「國際大眾社會」的理念、場合、禮儀、習慣、規範、制度和交往方式等內容，將會日益顯現，並同原來的「國際精英社會」發生承前啟後、新陳代謝的關係。

三 中美關係「大歷史」

儘管世界在經歷了兩極對抗以後，在二十一世紀開始進入一個多元國際社會的時代，但當前的國際政治仍然不免受到強國理念或「極」式思維的影響。對中美關係的種種看法，也難免仍在這種思維框架中打轉。突破這種局限，既需要對中國捲入冷戰的短期歷史記憶做一些澄清，更需要對中美關係

大歷史的長期記憶有所提示。筆者最近聽到一個十分有趣的說法，將中美兩國在二十世紀尤其是冷戰以來的關係比喻為「漸行漸遠的朋友」²³。朋友、夥伴、盟國、敵人、對手等是國際關係中經常使用的概念。這些概念可以描述國際關係中的短期行為和狀態，但是不能揭示任何雙邊或多邊國際關係的長期發展趨勢。由此想到，既然中美關係的大歷史是全球化歷史的一部分，那麼在這個大歷史的框架裏，中美更像是兩個「漸行漸近的他者」。

（一）冷戰的短期記憶：「漸行漸遠的朋友」

關於中國和冷戰的關係，還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第一個問題是，中國何時、以何種方式加入了冷戰？中美關係在冷戰期間及其後幾十年的發展脈絡，是一個從敵到友，又從夥伴到對手的清晰過程。1972年《上海公報》以後的中美關係歷程，確似「漸行漸遠的朋友」。但是中國以至亞洲，在歷史上同冷戰究竟是甚麼關係，至今在學界還沒有共識²⁴。同兩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相比，對冷戰的參與者做出判定要複雜得多。用《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等有關一般戰爭的法律條文，無法判定國家或非國家組織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心理、文化諸方面，如何在兩大冷戰陣營之間作出了公開或隱秘的敵友選擇²⁵。比如，在冷戰時期經歷了殘酷熱戰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如何認定它們參與冷戰的時間和方式？本文提出這個問題的真正目的，是質疑用「冷戰」來界定這些國家在冷戰時期的歷史的合理性。實際上，在上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發生的越南戰爭、國共內戰、朝鮮戰爭以及其他一些衝突，其根源同亞洲國家在十九和二十世紀所受到的西方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衝擊密不可分。從更長的歷史眼光來看，這些熱戰的歷史意義，其實是亞洲國家對西方衝擊的漫長回應的一個片段。把這類亞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局限在冷戰的框架內，或稱之為美蘇各自的所謂「代理人戰爭」，實際是用美蘇冷戰觀挾持了這些區域、國家、民族自身歷史發展的意義。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在冷戰中同美蘇各自關係的變化應當如何解釋？美蘇兩國是冷戰的原教旨主義者，為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社會制度的優劣爭得你死我活。中國卻可以在二者之間游離，不拘一格。借助新近解密的史料，歷史學者對中蘇從同盟走向分裂的歷史，已經做出了幾種不同的解釋²⁶。但中蘇分裂只是中國的國際方針變化的開始。其後又有1972年的「中美和解」，聯美抗蘇；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接軌；1979年的「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同前「同志加兄弟」越南開戰；1980年代開始的「全方位外交」，準備同蘇聯的關係正常化。所有這些變化，可以理解為中國的地緣戰略選擇。但是中國政策變化所遵循的邏輯，很難僅僅從冷戰時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解釋。迄今有幾種說法，比如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百年馬拉松」說：認為中國有一個百年謀略，70年代同美國的和解和從

80年代似乎開始的「民主化」進程，只是中國利用西方和美國，力圖取而代之的步驟^②；還有「選擇性全球化」說：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突破了「民主＋市場經濟」的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為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和國家發展提供了「淺度全球化」範例^③；以及中國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說。這些說法雖然對中國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都突破了冷戰時期對所謂「紅色中國」的僵化定義，開始用中國元素重新審視冷戰時代的中國。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是贏得、輸掉，還是退出了冷戰？在一戰和二戰結束時，中國都位列戰勝國，但是如山東問題和《雅爾塔協定》(Yalta Agreement)所示，每次中國又是大戰終局的挫敗者。冷戰的較量遠比兩次大戰更加複雜，中國與冷戰勝敗的關係更難一目了然。第一，在冷戰結束之前，中國已經先後同美蘇達成「和解」，既不再是蘇聯的抗美盟國，也不再是美國的制蘇夥伴。所以中國與美蘇兩國各自的勝負，已經沒有休戚與共的關係。第二，中國從冷戰中全身而退，既無金甌之缺，也無國祚之壞。因此，從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意義上說，中國在冷戰的國際鬥爭中沒有明顯的失敗。第三，冷戰時期中國的國內戰線損失慘重。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還有邊疆地區的衝突，都給社會帶來了心理、物質乃至生命的損失和慘痛後果。第四，中國的改革開放不但終止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而且在經濟、文化、法規等諸多方面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接軌，在冷戰尚酣時便開始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起飛。或許，用勝敗來考量中國在冷戰時期的經驗並不十分恰當，但是中國在冷戰時期的得失值得研究和總結。

簡言之，在冷戰時期，中國以「革命國家」的身份捲入美蘇之間的惡鬥，又以「改革國家」的身份淡出，其傷也深，其利也豐，交織為冷戰中國的歷史記憶。

(二) 大歷史的長期記憶：「漸行漸近的他者」

冷戰後期，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表現為「漸行漸遠」，這是中美之間在歷史上恩恩怨怨的又一次反覆。但是在今天，我們已經對二十世紀以來的全球化趨勢有了足夠清晰的認識，可以在這些表面恩怨之下看到「漸行漸近的他者」的大歷史趨勢。這種趨勢包含了迄今中美關係在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兩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自中美兩國在十八世紀開始接觸以來，兩國關係發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構成了兩國關係漸行漸近的節點。這裏說的「漸行漸近」，無關乎兩國之間的情感和一時的敵友立場。這些節點反映的是中美關係性質的改變、層次的增加，以及交往的深化。中美關係從非常單薄的雙邊貿易開始，以後漸趨複雜，增添了宗教、外交、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移民、金融、安全、領土、環境、人權等內容。雙方對相互關係的訴求和理念，也

從簡單的貿易、外交管理，演進到文化理解、法律地位、發展模式、科技交流、實力對比、地緣抗衡等諸多方面。同時，無論中美是敵是友，兩片國土之間的時空距離愈益縮小，兩個社會之間的熟悉程度愈益提高，兩國人民生活的相互依存也愈益加深。十九世紀後半葉，二十幾萬中國勞工和其他移民將血肉之軀的「中國人」帶進美國社會^㉔。二戰期間，來到中國戰區的美國大兵也將活靈活現的「美國人」呈現於中國老百姓眼前^㉕。其後，國共內戰的烽煙導致了中美之間從友到敵的急劇轉變，但是並沒有逆轉雙方已經形成的緊密聯繫。全球化給中美關係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即使兩國處在敵對狀態，相互之間的滲透和影響也從未停止。在冷戰時期，中美一度互為仇讎，各自尋找攻擊對方的致命弱點，這導致了歷史上首次相互之間的深度干預。雙方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存在着相同的軟肋——美國的種族問題和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這些問題於是成為相互攻訐的題目和削弱對方的突破點^㉖。這種敵對的「親密」，後來又在雙方關係中增添了人權問題的層次。今天，中美關係又一次進入緊張時期，但是兩國之間的「貿易戰」和「科技戰」，以及雙方政策中的「脫鈎」、「去風險化」、「去美化」、「撤資」等措施，只是證明了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全球化的進程時疾時緩，範圍時窄時寬，但是這個大趨勢從未逆轉。中美之間的「漸行漸近」也是如此。

第二個特徵是，儘管經歷了兩個半世紀之久的相互熟悉過程，兩國仍然視對方為文化和價值觀意義上的異己。中美之間，雖然可以欣賞對方文化的花絮，但是從未認可相互價值觀的內核。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全球化有厚重的文化內涵，歐美國家是推動、規範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對不少西方以外的國家和社會來說，現代化的過程即是被西方接納的過程。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便身處這個全球化的過程之中，但是中美關係史的一個特別現象是，在美國改變中國的執念和中國固守自身傳統的應對之間，進行着一場曠日持久的博弈。

美國立國伊始就是傳教國家，對中國尤其有一種「布道衝動」。美國獨立以後，一些傳教士和商人一起來中國，耕耘這片在他們看來是精神和財富的處女地。鴉片戰爭剛剛結束，美國政府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更是懷着強烈的使命感來到中國，企圖以美國「基督教、科學技術和民主」的精神，引領剛剛受挫的中國。然而顧盛出使的結果，是同當時的清政府締結了《望廈條約》，給中國套上了「治外法權」的百年枷鎖^㉗。顧盛之後，又有無數形形色色的美國人懷着同樣的使命感來到中國。其中尤為位高權重的一位，是1972年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尼克遜。雖然地緣政治是當時中美和解的主要原因，但尼克遜仍然希望他的訪問可以使中國向資本主義企業敞開大門，讓民主和自由隨踵而至^㉘。只是在將近四十年之後，曾經為尼克遜訪華打前站的基辛格才得出中美分別代表「兩個大陸文化」的結論。這樣的兩個大陸文化只能「共同演進」(co-evolution)，而不能由一方改變另一方^㉙。然而，基辛格的結論似乎還沒有在兩國的政治精英之間形成共識。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面對西方衝擊的應對之道，已經由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作出了經典概括。晚清重臣的「體」和「用」，自然具有時代的特定含義，但是中國近現代歷史證明，這個經典闡釋的適用範圍，遠遠超越了張之洞的時代和他本人的政治文化觀念。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的百日維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一不是中西碰撞的產物，也無一不是「西事中用」的範例。在過去二百年間，中國在政府機構、社會制度、話語體系、意識形態、價值觀念、行為規範等方面，發生了向西方的大幅度傾斜。但是，儘管「新中國」幾次出現、無論全球化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給中國帶來了哪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歐美國家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文化和價值觀的他者。

在國際關係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層次的入江昭教授，在分析太平洋戰爭時期的美日關係時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以後的現代化過程，同美國已經不再有文化層次的衝突，所以太平洋戰爭只是美日之間的一場實力之爭，是美日關係史上的一個反常現象³⁹。在這方面，日本和中國形成對照。無論怎樣表述和評價中國的現代化過程，西方國家從未在文化上對中國有過真正的認同感。二戰期間，美國將中國位列四強並稱中國為「民主國家」，也只是戰時宣傳而已⁴⁰。同樣，在蘇聯領導人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一直是異類。「假黃油共產黨人」、「窩洞裏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的普加喬夫」一類的稱呼，自然地流露於蘇聯共產黨的文獻當中⁴¹。

對西方國家來說，恆久的「中國問題」的核心，從來就是一個文化問題。1922年，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以「中國問題」為題，寫了一部討論西方同中國關係的現狀與前景的著作。羅素認為，在中國同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諸關係中，文化是根本；中西文明之間如何交融，必須由中國自己擇優而取⁴²。在羅素的著作面世百年之後，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鎮哈佛大學編輯出版了兩卷《中國問題》(The China Questions)，探討涉及中國崛起和當代中美關係的八十多個題目⁴³。把「中國」視為問題，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學者通常對中國採用的文化視角，惟有在冷戰中暫時被「紅色中國」的視角所取代。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文化因素重新回歸美國的中國觀。在中美關係尚處蜜月期的1980年代，費正清這樣提醒讀者⁴⁴：

我們〔兩國〕未來的關係將繼續面對中美文化的衝突與和諧的萬花筒，僅此就足以使我們繼續對中國着迷。可以預見的是，兩國人民將在保持各自價值觀的情形下共處：一邊推崇公民自由，另一邊強調自我犧牲；一邊斥責警察國家，另一邊反對個人主義。……中國的確是不一樣的。

今天，中美蜜月早成過往，費正清所強調的中美關係的文化常態，也再次被當成中美交惡的因素之一，出現在美國的對華政策討論裏。

(三)「斯金納風波」和中美的第三次邂逅

孟子的「非我族類」和中國歷史上延綿不絕的「華夷之辨」，說明中國是以類設防的老祖宗。然而，以類設防絕不是中國人獨有的心理特徵，而是人類的通性之一，在今天被稱為「身份認同」。在這方面，美國非但不是例外，而且還是將「身份認同」推向極端的社會。在冷戰時期和以後的年代裏，由於黑人民權運動的推動，美國成為政治上對身份差異極度敏感、並且通過立法遏制身份歧視的國家。可是，正如福山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身份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Politics of Resentment*)所示，「身份政治」將今天的美國社會撕裂得七零八碎^④。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特徵之一，就是雙方相互的異類化(othing)。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J. Trump)對他的民主黨對手賀錦麗(Kamala Harris)的黑人身份橫加質疑，賀錦麗的團隊也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稱為「怪咖」(“weird”)^⑤。

如果「身份政治」肆虐只是當代美國內政的現象，那麼在世界歷史上，從來不乏按「國際身份」對不同國家進行的分類、選邊、排隊。冷戰結束以後，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國際身份識別不再時髦，以類設防的老行當便又開始了新的國際身份識別。在中國方面，指稱美國為「美帝國主義」的話語依然存在，但是已經和毛澤東時代的反對帝國主義話語有了極大的不同，針對的主要是美國歷史上的擴張行為和冷戰以來對別國的軍事干預，而不是美國制度^⑥。在美國方面，「社會主義中國」已經不再具有清晰的意義。2019年4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管斯金納(Kiron Skinner)發表了一番引起轟動的言論。斯金納希望效法凱南(George F. Kennan)為美國冷戰政策定調的「X文章」(“X Article”)，為當時的特朗普政府起草一封指導對華政策的「X信件」。在一次同高層官員和智庫專家的對話中，斯金納說^⑦：

回顧同蘇聯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那是一場在西方內部的鬥爭。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他的哲學實際上出自一個更大的政治思想體系……其中的一些原理甚至與古典自由主義相合。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那是一場在西方內部的大規模爭鬥。蘇聯半是西方半是東方，但是它有些空隙使我們得以在1975年締結了《赫爾辛基協定》，而後以非常重要的西方觀念打開了蘇聯的門戶，極大地削弱了這個集權國家……。這種情況對中國絕不可能發生。現在的鬥爭面對的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文明，非常不一樣的意識形態。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經濟競爭者……。另外，我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將面對一個不是白種人的強國競爭者。

斯金納的這番言論，不但引發了美國媒體的各種批評，也遭到了來自中國政府最高層的駁斥^⑧。輿情所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澄清，堅稱美國從來

沒有以「文明衝突論」指導外交政策，美國及其盟國一直致力於推進政治透明、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原則，而這些原則和價值是中國政府公開表明接受的^④。

斯金納出師未捷，未能重複凱南的故事。有論者認為斯金納的觀點絕非一時口誤，而是暴露了特朗普主義看待國際事務的真髓^⑤。不過，「斯金納風波」的意義恐怕不限於此。如費正清所言，197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思維開始「解凍」，也就是不再用反共的單色眼鏡來看中國。但是其後冷戰結束、國際恐怖主義蔓延、中國崛起等，都影響了美國政策精英的思維重構。這個思維重構的過程至今仍在繼續，斯金納的中國論就是這個過程的努力之一。這個思維重構的過程，既包括對美國國際霸主地位的堅持，也有對中國國際身份的重新想像。斯金納的觀點與那些將當前中美關係冠之以「新冷戰」或「冷和平」的表述一樣，反映了美國政策精英在思考中美關係現狀時的歷史認知盲點^⑥。上述引文的歷史缺失顯而易見：其一，至今中國已在西方的「政治思想體系」中浸潤了一個多世紀，從內到外多拜西方所賜；其二，今天美國也並非首次以對手的身份與中國相遇，而是事必有三，前緣後果。

自從中美關係在歷史上發生以來，被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稱之為「偉大實驗」的美國民主制度一直沒有中斷^⑦。中國則不然，國家、社會幾經涅槃。在文明衝突、種族偏見盛行的十八至十九世紀，年輕的美國第一次邂逅中國，開始同一個陌生的老大文明國度打交道。前面提到的美國特使顧盛，就是以中國是異教徒國家為理由，把「治外法權」寫進中美之間的第一個條約^⑧。冷戰期間，美國遇到了翻天覆地的第二個中國，以往對「儒道中國」的知識積累已經無法用於對「紅色中國」的判斷。在1970年代以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只能用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對蘇聯的理解，稍加修改後套用在中國身上。1972年以後，中美關係「解凍」並走向正常化，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程，第三個中國得以孕育和發展，在二十一世紀又以一種新的形象呈現於世人面前。於是，同中國前幾千年歷史毫無瓜葛的美國，在短短的兩百多年時間裏，就遇到了孔學道統的「老中國」、毛澤東「不斷革命」的「紅色中國」、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的「特色社會主義中國」。近現代中國變化的速度和幅度，都令世人應接不暇。美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對中國更是關之愈切，迷之益深^⑨。中國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由於不同政治時代的疊加和中外關係的轉變，今日中國的精神世界呈現出調色板似的斑斕，難以用簡單的概念定義。有美國學者甚至認為，近代以來，中國不斷取捨一些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以圖實現「富強」，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切實的精神追求^⑩。

柯文(Paul A. Cohen)是當代美國最重要的中國歷史學家之一，他以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為例，專門研究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行為中的耐性^⑪。與中國的政治耐性相關的，還有胡適所說的中國的「文化惰性」或文化保守主義^⑫。在過去二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的這兩種性格似乎有一種微妙的關係：處於貧弱艱難的時刻，政治耐性就格外堅忍，而文化惰性則相對舒緩，突破傳統

和向外學習的願望也十分強烈；反之，自以為處於巔峰的時候，恥於向外學習的文化惰性就尤其執著，政治耐性也消弭於無形。十九世紀後期清政府的改革步驟，孫中山的以美、以俄為師，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都是中國自認落後而向西方取經並卓有成效的例子。1949年以後，中共對學習蘇聯經驗的態度發生了大翻轉，則是一個「耐性」和「惰性」在不同時間交替居於上風的例子⁵⁵。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以「體用」之學成就了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奇跡，也是中國又一次「耐性」與「惰性」的平衡周期。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鄧小平表明他到美國的任務之一是了解美國、學習一切對中國有用的經驗⁵⁶。鄧小平的急迫感來自他親眼目睹的、中國和美國之間在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極大差距。但是，鄧小平所謂的「對中國有用」，意味着中國不會採納美國的政治體制，而是只學習適合自身特點的制度和方式⁵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美國對中國的「有用」之處進一步縮小。據小布殊(George W. Bush)總統任內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回憶，當時中國的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對他說：「你曾是我的老師，可是現在我進入了老師的領域，看見了你們的制度，我不確定我們是否應該繼續向你們學習。」⁵⁸這次對話，預示了最近一次美中「師生關係」的結束。

所謂「耐性」和「惰性」，都反映出漫長的歷史帶給中國人的一種特有的時空觀。這種觀念與講究效率和速度的西方觀念大相逕庭。美國自身短暫歷史的線性發展，以及美國總統政治的特性，極大地限制了美國政策制定者對中國現象和行為的應對之道。在和中國交往時，美國的政治人物往往表現出時空上的錯位。2021年上任不久，拜登就公開表示，不能允許中國經濟在他的任內超越美國(“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on my watch.”)⁵⁹。現在拜登總統任期將盡，果然所言不虛。但是在中國的時空發展上，「拜登的手錶」所標記的時間，又何其短矣。根據不同的研究，中國在1400年、1600年和1800年，早已有過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資歷⁶⁰。中國在歷史上的興衰輪替現象，不同於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先興後衰的大國，近幾十年中國的所謂崛起，不過是中國自身歷史發展的又一個周期而已⁶¹。

究其實，在歐美政治精英的眼中，今天中國的挑戰是來自於文化/價值觀，還是來自於實力，抑或來自於二者的結合？在國際關係中，實力向來是共同語言，文化卻往往是交往障礙。前述入江昭關於國際關係的「實力—文化」論，在近現代東亞國際關係史的進程中，未嘗不可以反轉來理解：日本在1941年發動對美戰爭，恰恰是日本在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皈依西方的一個結果。東亞國際關係史的事實是，在所有東亞國家中，日本向西方學習最勤，進步也最快。日本先是追隨西方列強的殖民行徑，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帝國，爾後又通過一戰，悟到了美國的勝利之道在於堅實的經濟力量，於是不惜對亞洲鄰國發動侵略戰爭以達到建立獨立經濟實力的目的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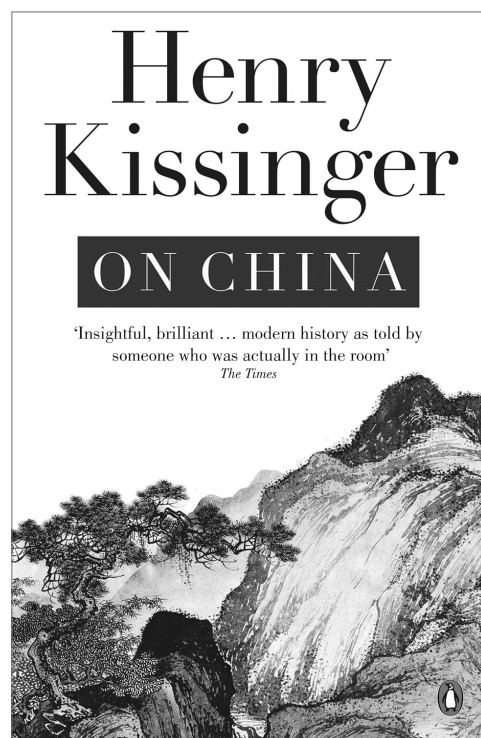
因為中意於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給美國帶來的利好，日本發布「天羽聲明」，企圖在東亞複製美國在西半球劃定勢力範圍的做法。這一系列的師事西方，導致日本踐行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觀點，即「安全悖論」(security dilemma) 的行為怪圈，於1941年12月7日在太平洋一腳踏進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③。由此看來，太平洋戰爭中的美日實力之爭，同日本對西方國際關係文化的亦步亦趨，有着密切的因果關係^④。依此類推，那麼今天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條件之一，反倒是兩國繼續互為「他者」。

四 結語

中美關係的前景，究竟將證實艾利森提出的力傾必戰的「修昔底德陷阱」論，還是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認定的俗異即敵的「文明衝突」論？這只是局限於西方政治智慧框架裏的設問。這些觀點擺脫了過時的冷戰思維，卻又試圖刷新一些更為古老的所謂鐵律，基調建立在人類處理「我」、「他」關係時經常顯現的劣根性。薩克斯在論述全球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位科學家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的誇張卻令人深思的判斷：「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組織機構，上帝一般的科技能力。」^⑤人類進化的諷刺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化，造成了人類生活愈益的相互依存，但是這種相互依存，卻因為人類情感

和組織機構全球化的遙遙落後，使得這個世界愈加危機四伏。或者可以說，專司人類情感、組織的人文社科才俊改善世界的的能力，總是遠遠落後於推動科技發展的理工英傑認知世界的速度。

儘管落後於科技，人類情感的全球化仍在進步之中。對中美關係提出見解的西方智者除了以上兩位，還有過費正清、傅高義 (Ezra F. Vogel)、基辛格這樣另有見解的人物。尤其是基辛格，學而優則仕，直接參與和影響了中美關係在第二次歷史邂逅中的和解，爾後又見證了中美之間第三次歷史邂逅所帶來的懸念。或許是出於同中國交往的感悟，或許是受到哈佛大學前同事費正清的影響，晚年基辛格對中美關係的關注從實力轉向文



基辛格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出版了《論中國》一書，為中美關係的前景留下了「共同演進」的勸誡。(資料圖片)

化，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出版了《論中國》(*On China*)一書，為兩國關係的前景留下了「共同演進」的勸誡⁶⁶。這無疑是基辛格留給中美兩國和二十一世紀世界最重要的遺言。今天參與有關中美關係政策制訂的人，可以從《論中國》中獲得啟發，而不必忙着「反基辛格之道而行」(“reverse Kissinger”)⁶⁷。

美國經歷冷戰依然屹立，中國通過冷戰由衰而強，說明兩國都是冷戰紅利的最大受益者。由冷戰鋪墊而成，今天的中美兩國相生相向，在前所未有的「親密」狀態下展開競爭，這也是全球化悖論的大趨勢所致。從國際關係史的歷程來看，美中兩國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演進至今，在不同文化圈裏造就的「民族國家」的兩大碩果。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一個歷經五百餘年的春秋戰國多國體系，數百國的競逐局面最終墜於一統。起自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另一種發展軌迹，至今三百餘年，期間霸主頻出，但世界國家的數量未減反增。歐洲國際關係體系在全球擴張的歷史證明，無論強權國家如何登「極」稱霸於一時，都無法根據自己的意願，使地球上眾多的民族和文化歸於一。身處不同文化單元的美中兩國，減少一些登峰造極的企望，增加一些多元共濟的關懷，會有助於人類度過二十一世紀餘下的四分之三。

這不是書生氣的善良希望，而是時代的嚴峻要求。今天的世界苦於兩戰(俄烏、以哈)一爭(中美)，不僅是因為這些事件造成的殘酷殺戮和帶來的全球恐慌，還因為它們在世界最需要人類展現迎接未來的睿智、寬容、和衷共濟的時刻，暴露了人類依然停留在過去的迷惘、偏執和相互忌恨之中。二十一世紀剩下的時間，將進入全球化的第八個時代，即由人工智能開啟的人類2.0。基辛格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將注意力轉向人工智能革命即將帶來的鉅變。他和幾位科技界的領軍人物合作，連著兩書以喚起世人的注意。兩書的主旨都是將人工智能提到對人類生存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高度，警告人類必須立即行動，避免科技發展走到人類的對立面⁶⁸：

我們將需要一種全新的控制形式。對於全球科學界來說，當務之急是找到技術措施，在每個人工智能系統中植入內在保障措施。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責任則是，一旦它們達成共識並由此集結起來，就必須拓展出一種政治結構，可以實行針對人工智能系統的監測、措施的貫徹和危機的應對。這裏要求解決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致性問題」：人類的價值觀和意圖與人工智能行為的技術一致性，以及人類相互之間的外交一致性。

歸根到底，所謂兩個一致性的問題，同是關於人類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普世大同的問題。在紛爭不絕的當今世界，上述引文讀起來好像是最新版的烏托邦。在用人類價值觀規範人工智能的行為之前，如何先從現存人類的種種價值觀中提取一個普世的價值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張的「外交一致」，是當今國際關係體系的源頭，而這個「外交一致」維護的恰恰是各個主權壁壘之間

的差異。人工智能時代的「外交一致」，又該如何成就一個超越主權壁壘、打破價值藩籬的「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規範這一時代的人類行為？面對這些人類共同演進的大難題，基辛格關於中美「共同演進」的主張或許只是解題的第一步。

註釋

①⑬⑭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59; 452, 459; 477.

② “Cold War II: Niall Ferguson on the Emerging Conflict with China | Uncommon Knowledge” (24 April 2023), www.youtube.com/watch?v=KDLTUMIR4jg; Fareed Zakaria, “Winning the Cold Peace: A New Path for U.S.-China Relations” (8 August 2024), www.youtube.com/watch?v=yONigEqhQSc.

③ Amy Hawkins and Helen Davidson, “Return of the Wolf Warriors? China’s Fiery 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 *The Guardian*, 7 March 2023,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mar/07/china-foreign-minister-qin-gang; Charmaine Jacob, “In a New Round of ‘Panda Diplomacy’, China Sends Giant Bears to the U.S. after Two Decades” (27 June 2024), www.cnn.com/2024/06/27/panda-diplomacy-china-sends-giant-pandas-to-us-for-1st-time-in-20-years.html.

④ “On History”, in Paul Valéry, *History and Politics*, trans. Denise Folliot and Jackson Mathew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2), 114.

⑤ 有關的兩本經典著作是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3);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60)。

⑥ 下列觀點得益於美國冷戰史學家萊夫勒對今天中國和冷戰時蘇聯之間差異的分析。參見 Melvyn P. Leffler, “China Isn’t the Soviet Union. Confusing the Two Is Dangerous”, *The Atlantic*, 2 December 2019, 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2/cold-war-china-purely-optional/601969/。

⑦ Mohammed Hussein and Mohammed Haddad, “Infographic: US Military Presence Around the World” (10 September 2021), www.aljazeera.com/news/2021/9/10/infographic-us-military-presence-around-the-world-interactive.

⑧ Brian Wong, “ASEAN Nations Are Neither Pro-America Nor Pro-China. They Are Pro-ASEAN” (19 April 2024), 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sean-nations-are-neither-pro-america-nor-pro-china-they-are-pro-asean; Carisa Nietsche, “Don’t Force Europe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Diplomat*, 14 December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dont-force-europe-to-choose-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china>; Nguyen Minh Ngoc, Nguyen Hoang Tien, and Mai Van Luong, “Pro-China or Pro-USA? Choices for Vietnam Nation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Strategy”, *Journal of Critical Reviews* 8, issue 1 (2021): 212-29.

⑨⑱ Henry A.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30-31, 371; 520, 526.

⑩ 參見維基百科的“Second Cold War”詞條，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Cold_War。

⑪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⑫ “World-Political”, in J. G. Bartholomew, *The Times Survey Atlas of the World* (London: Times Printing House, 1922), plate 7.
- ⑬ Odd A.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 92.
- ⑭ Jeffery D. Sachs, *The Ages of Globalization: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 ⑮ Hsiao-ting Lin, *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一書對冷戰如何改變了台灣問題的方向，有詳盡的描述。
- ⑯ 「冷戰的棄嬰」是CIA涉藏人員對西藏和那場秘密戰爭的關係的一個看法，參見John K.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筆者對1949年以後西藏問題的看法，參見Xiaoyuan Liu, *To the End of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ibet, 1949-195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 ⑰ Hicks Peter, “‘Sleeping China’ and Napoleon”, www.napoleon.org/en/history-of-the-two-empires/articles/ava-gardner-china-and-napoleon/。有關拿破崙對中國做過的類似評論和對那個時代的影響，參見William Speer, *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tford, CT: S. S. Scranton and Company, 1870), 664。
- ⑱ 田喆、易潔：〈美國觀察|再續半年：《中美科技合作協定》談判受阻，前路如何〉(2024年3月25日)，復旦發展研究院網，<https://fddi.fudan.edu.cn/2b/d7/c21253a666583/page.htm>。
- ⑲ Adom Getachew,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⑳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Newsweek*, 12 May 2008, <https://fareedzakaria.com/columns/2008/05/12/the-rise-of-the-rest>.
- ㉑ Valeksa Huber, “Globalizing Public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9, issue 2 (2024): 545-50.
- ㉒ 在香港理工大學於2023年6月主辦的中國歷史研討會上，澳門大學歷史系王笛教授提出了這個富於啟發性的說法。
- ㉓ 相關的重要著作參見John L.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Odd A.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Paul T. Chamberlin, *The Cold War's Killing Fields: Rethinking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Harper, 2018); 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沈志華：《經濟漩渦：觀察冷戰發生的新視角》(香港：開明書店，2022)。
- ㉔ Louis Henkin, “Law and War after the Cold War”,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 issue 2 (1991): 147-67; Olivier Barsalou, “Making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Cold: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 Emerging Scholars Paper* 11 (18 September 2008), <https://iilj.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Barsalou-Making-Humanitarian-Law-in-the-Cold-2008.pdf>。兩位作者對國際法在冷戰及其後續國際衝突中遇到的困境，做了很有意思的詳細探討。
- ㉕ 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參見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9)；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⑳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2015).

㉑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11);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Nicholas Jepson, *In China's Wake: How the Commodity Boom Transform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Sou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㉒ Dong Wa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Histor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2013), 74.

㉓ 有關中國社會和美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時期的關係，參見 Zach Fredman, *The Tormented Alliance: American Servicemen and the Occupation of China, 1941-1949*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2)。

㉔ 參見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Roberson Taj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Cold War China in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㉕ John R. Haddad, *America's First Adventure in China: Trade, Treaties, Opium,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 6.

㉖ "William Safire Interview Transcription, March 27, 2008", Oral Histories: 2008-03-27-SAF,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㉗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㉘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ur Chinese Ally* (Washington, DC: War Department, 1944).

㉙ 參見潘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 著，林添貴譯：《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367；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13；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06。

㉚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Century Co., 1922), 3-8；中譯本參見羅素著，秦悅譯：《中國問題》（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頁 1-8。

㉛ Jennifer Rudolph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Maria A. Carrai, Jennifer Rudolph,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hina Questions 2: Critical Insights into US-China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㉜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④ Adam Nagourney, "Not One of Us: Trump Uses Old Tactic to Sow Suspicion about Harris", *The New York Times*, 2 August 2024, www.nytimes.com/2024/08/02/us/trump-tactic-suspicion-harris.html; Thomas L. Friedman, "Democrats Could Regret Calling Trump and His Supporters 'Weird'", *The New York Times*, 29 July 2024, www.nytimes.com/live/2024/07/30/opinion/thepoint?searchResultPosition=1#trump-democrats-weird.

④ 〈史鑒：美國歷史上的帝國主義行為〉（2020年7月19日），《中國日報》中文網，<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007/19/WS5f143b6aa310a859d09d8b93.html>；郭關玉、張衛國：〈從「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新時代如何發揚鬥爭精神〉，《黨建》，2023年第5期，頁66-68。

④ 轉引自 Abraham Denmark, "Problematic Thinking on China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s Head of Policy Planning", *War on the Rocks*, 7 May 2019,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5/problematic-thinking-on-china-from-the-state-departments-head-of-policy-planning>。

④ Tom O'Connor, "China Blasts 'Racist' U.S. Statement Calling It First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Newsweek*, 6 May 2019, www.newsweek.com/china-racist-us-statements-great-power-1416200; Liu Zhen and Teddy Ng, "China's Xi Warns of 'Stupid', 'Disastrou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15 May 2019), www.politico.com/story/2019/05/15/china-xi-jinping-clash-of-civilizations-1440898.

④ Bill Gertz, "State Department: No Civilization Clash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Times*, 3 July 2019, 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9/jul/3/inside-the-ring-state-department-no-civilization-c。關於「文明衝突論」，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④ Paul Musgrave, "The Slip That Revealed the Real Trump Doctrine", *Foreign Policy*, 2 May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2/the-slip-that-revealed-the-real-trump-doctrine>.

④ "Cold War II"; Fareed Zakaria, "Winning the Cold Peace".

④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Catharine Sawbridge Macaulay Graham, 9 January 1790", <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Washington/05-04-02-0363>.

④ 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9-33.

④ 關於美國對中國持續的深切關注，參見 Gordon H. Chang, *Fateful Ties: A History of America'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6-15。

④ 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④ 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④ 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1935年3月31日）、〈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1935年6月），載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425-29、552-54。

④ 對有關歷史的正面論述，參見王文兵：〈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自覺歷程〉，《湖南社會科學》，2023年第2期，頁28-35；汪裕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偉大歷史貢獻〉，《黨的文獻》，2006年第1期，頁35-42。

- ⑤⑥ 〈在美國會見各媒體記者〉(1979年1月31日-2月3日)，載《鄧小平講話實錄》編寫組編：《鄧小平講話實錄：會談卷》(北京：紅旗出版社，2018)，頁200-203。
- ⑤⑦ 〈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1979年10月4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年4月)，載《鄧小平講話實錄》編寫組編：《鄧小平講話實錄：演講卷》(北京：紅旗出版社，2018)，頁162-68、270-75。
- ⑤⑧ Henry M. Paulson, Jr., *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New York: Twelve, 2015), 240.
- ⑤⑨ Gavin Bade, "Biden: U.S. Locked in 'Battle' with China for Global Influence" (25 March 2021), www.politico.com/news/2021/03/25/biden-china-press-conference-478052.
- ⑥⑩ Elena Holodny, "The Rise, Fall, and Comeback of the Chinese Economy over the Past 800 Years" (8 January 2017), www.businessinsider.com/history-of-chinese-economy-1200-2017-2017-1；金星擘等：〈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的演變(公元1000-2017年)——對麥迪遜估算的修正〉，《經濟研究》，2019年第7期，頁14-29。
- ⑥⑪ 對世界歷史上大國興衰的過程最有教益的研究之一，參見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⑥⑫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⑥⑬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⑥⑭ 不同於入江昭認為的日本在二戰期間服膺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著名日本史學家道爾在對入江昭著作的書評裏指出，從「比較文化」的角度，日美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行為和理念更值得比較的方面，是雙方的帝國政策和手段。參見 John W. Dower, "Rethinking World War II in Asia",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2, no. 2 (1984): 155-69。
- ⑥⑮ Jeffery D. Sachs, *The Ages of Globalization*, 214。薩克斯引用的是已故美國進化生物學家威爾遜的著作，參見 E. O. Wilson, *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2)。
- ⑥⑯ 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多處引用費正清的著作，或可作為費氏學說對他影響的一個旁證。
- ⑥⑰ "Reverse Kissinger" 是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競選班底關於美國外交應該聯俄抗中的一種想法。參見 Yaroslav Trofimov, "The West's Next Challenge Is the Rising Axis of Autocrac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4 August 2024, www.wsj.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autocracies-china-russia-us-election-5dc42efb。
- ⑥⑱ 參見 Henry A. Kissinger, Eric Schmidt, and Craig Mundie, *Genes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pe, and 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24), 5-6。另一著作是 Henry A. Kissinger, Eric Schmidt, and Daniel Huttenlocher, *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21)。